

殖民地臺灣的

近代學校

許佩賢◆著



臺灣史與海洋史01

《殖民地臺灣的近代學校》

作者：許佩賢

策劃：曹永和文教基金會

執行編輯：葉益青

校對：許佩賢、林怡君、許旭輝

封面設計：翁翁

合作出版：曹永和文教基金會

臺北市106羅斯福路三段283巷19弄6號1樓 (02)2363-9720

遠流出版公司

臺北市100南昌路2段81號6樓

發行人：王榮文

發行單位：遠流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臺北市100南昌路2段81號6樓

電話：(02)2392-6899

傳真：(02)2392-6658

劃撥帳號：0189456-1

香港發行：遠流（香港）出版公司

地址：香港北角英皇道310號雲華大廈四樓505室

電話：2508-9048

傳真：2503-3258

香港售價：港幣127元

著作權顧問：蕭雄淋律師

法律顧問：王秀哲律師、董安丹律師

一版一刷：2005年3月25日

行政院新聞局局版臺業字第1295號

訂價：新台幣380元

若有缺頁破損，請寄回更換

版權所有，未經許可禁止翻印或轉載 Printed in Taiwan

ISBN 957-32-5474-3 (精裝)

YLib遠流博識網

http://www.ylib.com E-mail: ylib@ylib.com

臺灣史與海洋史 01

殖民地臺灣的



近代學校

許佩賢◆著



財團法人曹永和文教基金會◆策劃

◆遠流出版公司◆出版

【臺灣史與海洋史】系列叢書緣起

財團法人曹永和文教基金會

財團法人曹永和文教基金會成立於1999年7月。基金會成立的宗旨，主要在與相關學術機關或文教單位合作，提倡並促進臺灣史與海洋史相關之學術研究，並且將研究成果推廣、普及。因此，有關臺灣史或海洋史之學術著作、國際著作的譯述及史料編纂等相關書籍的出版，皆是本基金會的重要業務。

曹永和文教基金會成立以來，本於前述宗旨，多次補助出版與臺灣史或海洋史相關的學術著作、史料的編纂或外文學術著作的翻譯。接受補助出版或由基金會出版的書籍，有不少作品已廣為學術界引用。諸如，2000年起多次補助「東臺灣研究會文化藝術基金會」出版《東臺灣叢刊》，2000年補助播種者文化有限公司出版《臺灣重層近代化論文集》，2004年再度補助出版《臺灣重層近代化論文集》之續集《跨界的臺灣史研究——與東亞史的交錯》；2001年補助樂學書局出版《曹永和先生八十壽慶論文集》，2002年起補助出版荷蘭萊登大學與中國廈門大學合作編輯之海外華人檔案資料《公案簿》第一輯、第二輯與第四輯。

2003年補助南天書局出版荷蘭萊登大學包樂史教授(Leonard Blussé)主編之《Around and about Formosa》，2004年補助南天書局出版韓家寶

先生(Pol Heyns)與鄭維中先生之《荷蘭時代臺灣相關史料——告令集、婚姻與洗禮登錄簿》。本會也贊助相關的學會活動、邀請外國著名學者作系列演講，提供研究者交流的場域。諸如，1999年11月與中央研究院合辦「東亞海洋史與臺灣島史座談會」，2000年3月於臺灣大學舉辦日本東京大學東洋文化研究所濱下武志教授演講「談論從海洋與陸地看亞洲」，2000年10月與中央研究院與行政院文建會合辦「近代早期東亞史與臺灣島史國際學術研討會」。此外，為了培養臺灣史及海洋史研究的人才，本會與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合辦「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研讀班」之推廣活動。

為了使相關學術論述能更為普及，以便能有更多讀者得以分享臺灣史和海洋史的研究成果。因此，本基金會決定借重遠流出版公司專業的編輯、發行能力，雙方共同合作，出版【臺灣史與海洋史】系列叢書。每年度暫訂出版符合基金會宗旨之著作二至三冊。本系列書籍以新竹師範學院社會科教育系助理教授許佩賢女士之《殖民地臺灣的近代學校》與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研究員陳國棟教授《臺灣史與海洋史——陳國棟論文集》(暫名)為首；之後除了國內的學術研究成果之外，也計畫翻譯出版外文學術著作或相關史料。

冀盼【臺灣史與海洋史】系列叢書之出版，得以促使臺灣史與海洋史的研究更加蓬勃發展，並能借重遠流出版公司將此類研究成果推廣普及，豐富大眾的歷史認識。

序

臺灣大學歷史系副教授

臺灣成為日本的殖民地之後，日本殖民政府將其在本國已經建立起來的西洋式近代教育制度引進臺灣來，這被視為是除了晚清傳教士所進行的零星近代教育之外，臺灣西洋式近代教育的開始。所以，臺灣目前大家習以為常的學校教育制度，可以說是伴隨著臺灣的殖民地化而發展開來的。這種情況與另一項已經在臺灣生根的近代西洋式醫療制度，大致相同。「教育」與「醫療」，也就一直成為傳統肯定殖民主義者所強調的「殖民主義功績」，而且這種殖民主義肯定論經常將「教育」與「醫療」只視為一種工具，而忽略其意識型態的側面。但是晚近的研究則都在強調這種伴隨殖民主義而來的「教育」與「醫療」，不只是一種殖民主義的意識型態，而且也扭曲了殖民地原有的文化與社會脈絡。也就是說，具有文化史、社會史問題意識的研究，取代了傳統以制度史為重點的研究。

臺灣近代的教育制度，既然是在日本殖民時代所創建起來的，它也就必然地帶著「日本的」與「殖民的」性質。這些「日本的」與「殖民的」性質如何被植入「臺灣」這個具體的舞台當中，從而形成「日本」

「殖民地」「臺灣」的「近代」「教育史」，便成為一個包含了幾個重要問題的研究主題。這些主題都有待逐一深入的探討。根據我的瞭解，70年代末期美國學者派翠西亞·鶴見的《日治時期臺灣教育史》已經為這個分野做出了重要的研究，諸多問題也已經由她提出重要的見解。但是，國內似乎並沒有在該研究的基礎上進一步做出更有見地的問題解釋來。直到近大約十年來，臺灣的教育史研究才有新的展開，而在這一波臺灣教育史新展開的過程當中，許佩賢小姐可以說是一個相當突出的研究者。

許佩賢小姐的臺灣教育史，企圖擺脫傳統純粹的制度史研究，而另開蹊徑地轉向文化史、社會史的研究。她的早期研究是分析日本殖民時代公學校的教科書，開以後教科書分析研究的先聲。接著的主要研究成果就是收錄在本書的各個篇章。這些包括：殖民官府所建立的公共學校制度與臺灣社會之間的關係、近代學校裡的學習生活與學校經營、皇民化戰爭時代的學校實況等近代臺灣教育史的重要課題。這些研究，都必須面對前述的「日本」、「殖民地」、「臺灣」、「近代」等主題。許佩賢小姐對於這些主題的初步見解，可以參見本書的導論部分，其中應有許多足供參考之處。相信收集在這本書中的這幾篇文章已經為臺灣近代教育史的研究開闢出了新的水平，為臺灣近代教育史的重建與解釋提出了全新的見解。

但是，關於臺灣近代教育史，我想在此處提出許佩賢小姐這本書中沒有來得及提出的兩項課題。第一，雖然制度史已經不再是教育史研究的熱門主題，但是臺灣近代教育史中仍然存在著諸多重要的制度史研究課題（當然，這裡所說的「制度史」應該是廣義的制度史）。例如，伊澤修二主張以「國語」進行教育，以「師範學校」培養師資的制度設計，便仍然是一個影響深遠而不能逃避的課題。又如在臺灣教育法制化過程中扮演重要角色的隈本繁吉，雖然其任職期間遠較伊澤修二為長，而且

留下豐富的史料，但是卻未相對地受到應有的重視。第二，戰前與戰後教育史的連續與斷裂，應該是往後不能不進行的討論課題。雖然戰後的官方說法是對於戰前「殖民主義」教育的訣別，但是如果細究戰後教育的制度、人事，卻又不能不說存在著與戰前千絲萬縷剪不斷的延續性。甚至，戰爭時期以極端國家主義為指導原則的「國民學校」到現在都仍然存在呢！

自己的學生將其研究成果結集出版之際，我除了寫一篇捧場的推薦序之外，提出上述一兩項課題，也算是再給老學生一點習題吧！

目 錄

- 3 **【臺灣史與海洋史】系列叢書緣起／財團法人曹永和文教基金會**
5 序／吳密察

11 **導論**

第一部 學校與地方社會

- 26 近代學校的嘗試
 ——國語傳習所的成立與運作
61 近代學校的創設與地方社會
 ——公學校的經費問題
89 近代學校的發軔與地方社會
 ——新竹地區的例子

第二部 國家的教育要求

- 110 「殖民地少國民」的塑造
 ——戰爭時期的教科書
131 皇國健兒之道
 ——戰爭時期的學校動員

172	戰爭與義務教育的實施
-----	------------

第三部 規訓與逸出

198	「體操」、「唱歌」與身體的規律化
232	歷史意識與公學校的歷史教育
274	「規訓的舞台」與「舞台的規訓」 ——公學校的學藝會
294	教化、競爭與反饋的機關裝置 ——公學校的運動會
331	參考文獻
347	出版後記

導 論

學校的風景

現在的臺灣，進到絕大部分的小學或中學，都可以看到類似的「風景」。首先，有個圍牆把屬於學校的範圍圈起來；進了校門，映入眼簾的是共同校訓「禮義廉恥」四個大字；穿堂上用某種方式公告著孝順、友愛、勇敢、愛國之類的「德目」；一間間的教室裡面有整齊的課桌椅，前頭有講桌、講台及黑板，一群年齡相仿的學生坐在底下聽台上的老師講課。教室外面掛著「X年X班」的牌子以及功課表，走廊的盡頭多半是廁所；功課表上面記著星期一到星期六的課程安排，幾點到幾點上什麼課，一節課四十或五十分鐘，中間休息十分鐘。此外，學校裡面不可少的設施是升旗台、操場、禮堂和政治銅像。每天早上八點鐘升旗，聽司令台上的校長訓話，在操場上舉行運動會，在禮堂中舉行開學典禮、畢業典禮。

這種風景的歷史，大概只有一百多年。一百多年前，臺灣人可不用這樣的方式學習。中國自古就有「學校」這個名詞，不過中國古代的学校並不是老師教書的地方，而是指拜孔子的孔子廟，也就是所謂的「儒學」。真正從事教育的地方是遍布各地的私塾，臺灣多稱之為「書房」。書房通常設在地方廟宇或教書先生家中一角，並沒有像現在的學

校有特別規畫出來的校園和教室。書房沒有時鐘，當然也就沒有按鐘點分配時間的功課表，頂多用學生回家吃午飯為分界，分成上午和下午，從事不同的學習。在同一個書房學習的學生，從四、五歲啟蒙期背三字經、千字文的學生，到已經讀過四書五經各種程度的學生都有。學生年齡、程度都不一樣，老師當然也就沒辦法像現在的老師一樣，站在教室前方的講台上，一個人講給所有學生聽，只好把學生一個一個叫到老師跟前來背書、講書。

書房裡面學的東西以儒家經典為主，基本上是為了知書達禮或準備科舉考試用。不但沒有國語、歷史、地理、自然、算術這樣的科目；對學生來說，更重要的是，沒有可以到操場上活動玩耍的體育課或可以唱歌跳舞的唱遊課。書房沒有上下課，一整天坐在陰暗的空間中讀書，學生可能因為家裡有什麼婚喪喜慶的活動，好幾天不來上課，但也不會有跟不上進度的問題。一整年中沒有任何區隔，沒有星期六、星期日，沒有寒暑假，也沒有升級、留級的問題。也就是說，一百多年前的臺灣人，是在完全不同的學習環境、用完全不同的學習方式、基於完全不同的學習觀中學習。

臺灣近代學校的誕生

現在我們習以為常的學校形態，是一百多年前日本人引進臺灣的「近代學校」。日本本國自明治維新以後，深感教育是創建新國家、從事國民統合的利器，因此很快地便引進西方的近代學校制度，建立了自小學到大學的學校體系。1895年領有臺灣以後，日本認為對新領土臺灣也有國民統合的必要，因此決定也將這套明治以來在日本本國試驗成功的學校體系引進殖民地臺灣。

這種近代式的學校，是19世紀西方的產物。西方之所以在18到19世

紀之間出現這種學校的原因，其一是當時新成立的國家(nation state)希望從教會手中奪回對民眾的教育權，藉由掌控教育內容進行國民統合。因此，在學校中要教授國家的標準語(國語科)、國家過去的歷史(歷史科)與現在版圖的地理(地理科)；其二是由於要求受教育的人越來越多，國家也希望這種國民教育能更有效的普及所有國民，因此發展出「一對多」的「集眾教學」方式。因為「集眾教學」，才需要有共同的時間表，也才需要有設置黑板、講桌的教室。

由於有國民統合的需要，任何一個國家或政府其實都在不同的程度上，藉由學校教育體系傳達該政權所認可的意識型態，以幫助其統治。學校做為一個有組織、有計畫的教育場所，藉由對教育內容的掌控，以及在學校中舉行各種儀式，最能有效且集中地傳達統治者的意圖。引進近代學校體系的日本殖民政府當然也在臺灣利用公教育體系灌輸其意識型態，並且規訓兒童的身體。

日本殖民地教育的構想來自臺灣總督府第一任學務部長伊澤修二。伊澤認為教化新領土的前提是講求語言思想的溝通，因而提供語言學習的設施，讓臺灣人與日本人互相學習彼此的語言，是眼前的首要工作；同時，為了將臺灣人同化為日本人，也須考慮長遠的教育事業。

因此，最初日本在臺灣設置了國費負擔的國語傳習所及國語學校。前者以培養翻譯人才、以應付當下的行政需要為目的，後來發展為一般初等教育的公學校；後者以培養初等教育的師資為主要目的，即為後來的師範學校。

統治者雖然有教化臺灣人的需要，但是總督府非常清楚殖民地教育的結果很可能使被殖民者覺醒，進而造成殖民地統治上的困擾。所以，在1910年代之前，總督府並未在公學校之上，設置更高級的普通教育機關。臺灣人於公學校畢業後，僅能就讀少數的職業學校、師範學校或醫學校。

1910年代以後，臺灣士紳發起私立臺中中學校設立運動，終於使日本統治者注意到臺灣人的教育要求，而開始規劃規範臺灣教育的法令。1915年臺中中學校設立，為臺灣第一所臺灣人就讀的普通中學。1922年公布「臺灣教育令」，宣示日臺共學的原則，臺灣人原則上也可以就讀日本人的學校，在法制上作到一視同仁」。根據這個法令，準據日本內地的學校制度，在臺灣增設中學校、高等學校及高等女學校，做出小學到大學的普通教育學校體系，以臺北帝國大學為頂點，其間可以與日本國內教育機關銜接。

哈利波特的魔法學校：新學校的魅力

在殖民地統治之前，臺灣社會原本即有自己的教育習慣及學校觀，當日本引進這一套近代學校制度時，臺灣社會、特別是要入學的臺灣兒童，是怎樣看日本人所引進來的新玩意呢。

首先，呈現在兒童面前的學校，從兒童的眼睛所見、身體可以感受到的就是截然不同的氣氛。寫於日本統治末期有名小說《亞細亞的孤兒》作者吳濁流，基於自己的經驗，在小說中很明確的點出了在兒童眼中，學校的寬敞明亮帶來的新鮮刺激。他說：「學校裡的氣氛，究竟和私塾不相同，校內朝氣蓬勃，運動場和教室都是那麼寬敞和明亮，太明（書中主人翁一筆者註）頓感眼界為之豁然開朗。」¹

1920年代從事社會運動有名的楊肇嘉（1901年十歲時入學）回憶起小時上學時，開頭便說：「學校是兒童們的樂園。」²有臺灣新文學之父美

¹ 吳濁流，《亞細亞的孤兒》（臺北：遠景出版社，1980年初版，1993年再版），頁18-19。

² 楊肇嘉，《楊肇嘉回憶錄》（臺北：三民書局，1968年一版，1977年版），頁24。

譽的文學家賴和回憶兒時讀書時也說，和書房比起來，因為學校有自由嬉戲的時間，而更願意待在校園。³

近代學校的課程設計，除了國語、歷史、地理等新學科，一方面傳授新知識，一方面也傳遞國家理念的課程之外，還有體育、唱歌、圖畫等與傳統教育絕緣的課程內容。這些新課程除了是體現德智體的新教育觀外，也蘊含著國家的國民統合要求。透過體操課，塑造可以行動、韻律一致的國民身體，唱歌科，透過齊聲合唱的身體練習，也具有同樣的效果。然而看在臺灣民眾眼中，那無異是「玩樂」。

1930年代代表性的作家之一的張文環在小說〈論語與雞〉中寫道：「源仔(文中主人翁—筆者註)想要看圖畫書，想要在院裡裏公然玩耍，也就是在公認允許之下，在院子裏大吵大鬧，或大聲唱喜歡的歌。想要使用顏料畫很多東西，也就是希望進入那樣的學校生活，他覺得書房的教育方法過於無味。」⁴在兒童眼中，下課休息時間或是體育課的活動身體就是「公然玩耍」、「大吵大鬧」，唱歌課就是可以大聲唱喜歡的歌，而這些活動在傳統的教育觀中顯然是不被鼓勵的。

除了從來沒體驗過的新課程之外，學校也經常舉辦神奇的理化學實驗、播放幻燈及活動寫真(電影)，還有運動會、學藝會表演等多彩多姿的活動。就像哈利波特的魔法學校一般，對兒童來說學校充滿著神奇、新鮮的魔法。日本時代的臺灣人、特別是知識分子都在某個程度上受到近代主義的洗禮，他們深深的被近代的魔法所吸引。

³ 賴和，〈無聊的回憶〉，收於李南衡編，《賴和先生全集》(臺北：明潭出版社，1979年)。

⁴ 張文環，〈論語與雞〉，原發表於《臺灣文學》1:2(1941年9月)，譯文收於陳萬益主編，《張文環全集》卷2(臺中：臺中縣立文化中心，2002年)，卷2，頁21-40。